
抗战时期孔令侃与南尖社在香港的活动

孙 扬

【摘要】 1936年3月,孔令侃召集圣约翰大学同学沈震百等人在上海成立南尖社。全面抗战爆发前,该社表面以学术研究为志趣,实质成为孔令侃为今后事业发展打造的小班底。上海沦陷后,该社以香港为基地,参与了孔祥熙与孔令侃负责的一系列秘密活动。除在对日交涉和中德易货贸易中承担联络和事务工作之外,南尖社的使命还包括对日、对英情报收集和暗杀暗附敌分子。1939年被香港政府查处。

【关键词】 孔令侃;南尖社;中央信托局;香港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17)05—0141—12

【作者简介】 孙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210023

既往历史叙述中的孔令侃,作为1948年“扬子公司舞弊案”主角,留给国人的印象是权贵子弟和行事荒唐、贪赃枉法。然而,历史人物总是有其复杂的面相,例如有学者揭露孔氏父子在战时军火贸易中“公不忘私”,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孔令侃头脑灵活、经营有术;孔家的确利用特权中饱私囊,但是战后扬子公司的套汇数额也确实被人为夸大。^①当然,本文绝无意为孔令侃翻案或辩白。笔者撰文初衷只是试图弄清楚,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际,青年孔令侃有过怎样的抱负、实践与挫折。或许本文的视角可以从一个特殊的层面揭示抗战中一些重要而在既往论述中被忽略的历史细节。

一个小团体的兴衰或许可以提供观察孔令侃早年经历的一种视角。南尖社是孔令侃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期间成立的,上海沦陷后,该社成员以中央信托局为依托,以香港为基地,活跃在沪港两地,参与了孔祥熙与孔令侃负责的一系列秘密活动。在既往研究中,尽管有关孔祥熙家族的学术或通俗著作大多会提及该组织,但史料来源无外乎时人忆述,对南尖社的成立时间、人员组成、政治理念、活动细节等尚缺乏严谨考证。^②而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记载了香港政府搜集的孔令侃与南尖社在港活动的详细情况,从而提供了一批较为可靠的资料。本文以英方档案文献为基础,辅以报刊、忆述等史料,从成立与成员、组织与活动以及搜查与善后三方面,对抗战时期孔令侃与南尖社在香港的活动进行考证和论析。对于既往研究详论之处,本文从略;由于资料所限,笔者一些论断仍属推测,尚祈方家指正。

①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郑会欣《“理财高手”孔令侃》,《世纪》2013年第2期;郑会欣《关于孚中、扬子公司套汇数目的争论及其真相》,“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1期,2008年。

② 目前几乎所有提及南尖社的论著,其史料依据均来源于徐家涵和邢铎二人的回忆文章。徐家涵,即徐季泽,安徽秋浦(今东至)人,徐传友之子。他与孔祥熙家族关系密切,长期任职于中央信托局,曾在西南运输公司和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邢铎,1933年入读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学专业,1937年毕业于。他是孔令侃的同学,南尖社成员,在孔公馆办事处工作多年。两人的回忆文章见徐家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81—120页;邢铎《孔令侃与孔公馆办事处见闻》,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233—244页。

一 孔令侃与南尖社的成立

南尖社成立之初并非秘密组织,而更像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1936年出版的《约翰年刊》刊登的《南尖社小史》一文有如下描述:

好学无友势必孤陋寡闻,仝人等鉴于此弊,乃经孔、刘、庄、沈、罗、王、潘、温、杨诸君之商讨,立议结社,以冀交谊更进,藉获他山之助。爰于岁之暮春五日,创立斯社,而聘韩玉珊博士为本社顾问焉。续后加入者有何、钱、陈诸君。是本社之史。备级幼稚而无足可述者。谚曰,有志竟成,则本社前程之美满可得而几欤。

由上文“岁之暮春五日”可知南尖社成立于当年农历三月初五,对照公历应是1936年3月27日。^①孔令侃时年20岁。南尖社成立之初,规模有限,加上顾问,总共只有13人。1936年《约翰年刊》不仅刊出该社全部成员姓名及社内职务,亦配发全体成员合影。笔者根据《约翰年刊》所载姓名,辅以相关资料,将南尖社成立初期的成员状况罗列于下表:

表1 南尖社成立初期成员状况(1936—1937)

职务	姓名	略 历	备 注	
顾问	韩玉珊	1899年生于北京,192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28年哈佛大学研究院肄业,次年获波士顿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圣约翰大学副教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后赴美定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历史系教授。		
职 员	社 长	沈震百	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经济)。曾任中央信托局职员。	
	社 副	罗明湛	1913年出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任香港金城银行总经理,1978年逝世。	罗文庄之子,罗文干之侄,黄绍竑之婿
	总务股长	刘松年	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	
	交际股长	潘绍亮	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理学士(土木工程)。后赴台湾,曾任职于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	
	财务股长	庄芝亮	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经济)。曾任上海英文《大美晚报》编辑、英文《大陆报》发行人。	
	文牍股长	王 仁	1938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经济)。曾任上海《大晚报》负责人。	又名王乐山
基 本 社 员	孔令侃	1916年生于上海,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政治)。曾任财政部特务秘书、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等职务。1939年9月,香港政府查获其秘密设立的电台,孔令侃被迫离港赴美。抗战后,孔令侃回国创办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后赴美国定居,1992年病逝于美国纽约。	号刚父,孔祥熙之子	
	何然棣	1936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经济)。曾任中央信托局储料处技士,战后任职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	又名何仁山	
	钱起凤	1937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理学士(土木工程)。曾任中央信托局职员,战后曾在扬子公司纽约分公司任职。	又名钱肇兴	

^① “暮春”通常指农历三月,因1936年有闰三月,故南尖社的成立日期也可能是公历4月25日。该社首任社长沈震百曾于1937年2月出版的《南尖季刊》创刊号前言中明确提到“本社于去年3月成立”,由此可以推断,南尖社成立日期应当是1936年3月27日。沈震百《前言》,《南尖季刊》创刊号,1937年2月。

(续表)

职务	姓名	略 历	备 注
基本社员	温陵熊	1917 年生于南京,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哈佛大学毕业,内燃机专家。1950 年移居美国,曾于多家公司任职,受聘为台湾当局“经济部”顾问。1979 年病逝于美国。	温应星之子,温哈熊之兄。其女温子华适董浩云之子董建成
	杨光敏	1941 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文学士(教育)。	邢铎回忆文章中写作“杨光明”
	陈继恩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	孔令仪前夫

主要资料来源《约翰年刊》(The *Johannean* 1936, the Willow Patten Press) 第 22 卷,第 204 页;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附录 6《圣约翰大学历届毕业生、肄业生名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4—578 页;郑会欣编注《董浩云日记》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1500 页;易碧胜《罗明燏传》,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 页。

南尖社成立之初,成员身份分为“顾问”“职员”和“基本社员”三类,孔令侃并未亲任社长,仅为基本社员。据邢铎所言,孔氏此举意在“避人耳目”,之所以选中沈震百,因其与同学且同屋,常为孔令侃办一些私事。^①除《约翰年刊》所载南尖社成员名录外,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陆续加入该社的还有蒋曙东、周其镛、沈沂方、邢铎、姚文凯、顾心逸、林世良等人。^②总体而言,南尖社成立之初的成员,或是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或是与孔氏家族关系密切。他们大多出身富贵家庭,就读于教会大学,是一批生长于极为特殊的环境之下又在极为特殊的学校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

成立之初的南尖社,更像是一个以学术研究为志趣的学生社团,且带有浓厚的精英意识。南尖社公开表达的理念与宗旨,无外乎“志同道合”“共信互信”“民族复兴”等。社长沈震百将筹组动机归结为“由于数年来同志的意向和需要所促成的。”^③顾问韩玉珊将结社缘由表述为“十数同志,因意志的结合组成南尖社;以道义为友谊,以奋斗为途径,以民族复兴为职责。从此‘共信养成’‘互信’,无往不达,当可预卜也。”^④孔令侃则强调该社成立目的在于:“本着亲爱精诚的精神,互助,互导,相与切磋,祛浮嚣之心性,造坚毅之气质,探讨各种理论,切实研究学术。”^⑤然而,社名缘何定为“南尖”?不仅《约翰年刊》所载《南尖社小史》未曾提及,该社公开出版的社刊《南尖季刊》亦未有任何篇章说明。邢铎认为“社名采用‘南尖’二字是有来由的。就我所知,他们仰慕当时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党,德语 Nazis 与上海‘南尖’发音相似,所以采用这两个字,以示仿效纳粹党的团结和忠诚。”^⑥徐家涵的说法与邢铎相似,他回忆“我曾问过他们的核心人物,‘南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就是‘纳粹’的译音。”^⑦英方档案间接印证了南尖社崇尚纳粹意识形态,香港警队代理副督察埃里斯(R. Ellis)在给港督的报告中提到,他们发现南尖社内部的一份报告中有如下文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通过组织失业青年和退伍军人复兴德国。无论对错,我希望上峰追随这个榜样。”^⑧结社之基础,固然在于志同道合,对于南尖社而言,核心人物是孔令侃,他试图在毕业之前为自己打造一个追随左右的小班底,以助力将来事业的发展。大多数成员与孔令侃同届毕业,他们很快被延揽进入孔氏家族所掌控的金融系统,如中央信托局等机构,其个人的命运也与孔令侃的政海沉浮绑在了一起。

① 邢铎《孔令侃与孔公馆办事处见闻》,寿充主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 234 页。

② 邢铎《孔令侃与孔公馆办事处见闻》,寿充主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 234—235 页。

③ 沈震百《前言》,《南尖季刊》创刊号,1937 年 2 月。

④ 韩玉珊《南尖社首次发刊感言》,《南尖季刊》创刊号,1937 年 2 月。

⑤ 孔令侃《南尖社刊弁言》,《南尖季刊》创刊号,1937 年 2 月。

⑥ 邢铎《孔令侃与孔公馆办事处见闻》,寿充主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 234 页。

⑦ 徐家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寿充主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 89 页。

⑧ R. Ellis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October 4, 1939, FO 371/23520, p. 219. (FO 系英国外交部档案,原档案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本文引用皆来源于“SAGE 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国 1919—1980”数据库)

至少在1937年2月之前,南尖社已有上海、广州两处分社。^①淞沪抗战爆发之前,南尖社的活动以上海为中心,此后移至香港。而成立之初,南尖社最主要的活动是出版发行《南尖季刊》。《南尖季刊》原计划办成公开且连续出版的杂志,由于战争爆发,只完整出版了两期,分别是1937年2月出版的创刊号和同年6月出版的第2号。两期杂志篇目如下表:

表2 《南尖季刊》创刊号及第2号篇目(1937年)

《南尖季刊》创刊号(1937年2月)		《南尖季刊》第2号(1937年6月)	
署名	篇名	署名	篇名
沈震百	《前言》	论 述	
孔令侃	《南尖社刊弁言》	寿毅成	《日本专卖制度之沿革及其最近进展之趋势》
韩玉珊	《南尖社首次发刊感言》	潘世杰	《中国之外汇市场及其现状》
编 者	《白话》	侃 ⁽¹⁾	《中国统一成功与精神物质建设的关系》
	论 述	延 ⁽²⁾	《现时政治与经济思潮之动向》
孔令侃	《一九三七年国际政局之展望》	幻 闻	《日本经济考察团之面面观》
李应兆	《我国宜施遗产税问题》	无 涯	《改进政治之意见》
顾绥祿	《苏俄经济政策之演进》	疆	《王安石之政治思想及其新法论略》
厚 安	《改进我国行政机构之意见》	高 文	《黄宗羲顾炎武政治思想异同述(续)》
高 文	《黄宗羲顾炎武政治思想异同述》	周英柏	《县单位之田赋问题》
韩亦琦	《金本位制的崩溃及其影响》	乔 木	《中国一年来之铁路建设》
钱用和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出路问题的背景》	起 凤	《基桩之承量与设计》
郑天牧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农民吃饭问题》	刘宗武	《复兴的准备》
秋 ⁽³⁾	《行政上单一制与合议制利弊之研究》	尚 笏	《变迁考》
张龙章	《日本内阁之研究》	清 水	《印度之独立运动》
朱金声	《弱小民族解放运动》	林启森	《苏俄革命之历史背景》
顾绥祿	《劳工与机械》	胡令德	《布白论》
满	《拟辑公法释义》	翻 译	
	杂 文	辰 白	《中日的命运》
孔令仪	《游美杂感》	张龙文	《战争之近代性与国家总动员》
记 者	《蒋院长西安蒙难记》	陆 夫	《战费之今昔》
闵侠卿	《实验室中之新发现》	王家焕	《所谓“猪仔贸易”》
	诗 歌	陵熊 ⁽⁴⁾	《间谍生活》
威 廉	《病恢恢》	杂 俎	
威 廉	《秋》	高 文	《赠张子琳兄》
威 廉	《大海一片苍》	威 廉	《在瓶花影下》
威 廉	《在车中》	达 源	《呻吟》
威 廉	《几片薄的朝霞》	流 年	《一个镍币》
	小 说		
起凤 ⁽⁵⁾	《恋》		
	翻 译		
何然棣	《中国民族复兴的危机》		
	转 载		
鲁学瀛	《对于美国应有之认识与期待》		
尚 笏	《西藏问题中之活佛》		

备注:(1)侃,即孔令侃;(2)延,即陈延祚;(3)秋,即申剑秋;(4)陵熊,即温陵熊;(5)起凤,即钱起凤。

资料来源 《南尖季刊》创刊号,1937年2月 《南尖季刊》第2号,1937年6月。

① 沈震百《前言》,《南尖季刊》创刊号,1937年2月。

《南尖季刊》作者并非皆为南尖社成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孔令侃的人脉关系网络。刊物所载文章,政论、学术与文艺兼而有之,其中相当一部分论述与经济、财政、金融方面的话题相关,包含了孔令侃及其同仁在经济层面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和对时局走势的判断,从中可以管窥这个小团体的精神世界。可以设想,若不是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爆发,孔令侃及其同仁将以上海为舞台,以金融系统为活动根基,在经济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时局的变化终结了南尖社的上海时代。对于战争全面爆发,孔令侃似无预期。1937年初,对于当年国际形势,孔令侃就“世人均呼之曰‘国际危机年’;意谓世界第二次大战,将于本年内爆发”的论断,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就亚太局势,他认为“罗斯福蝉联美国第三十三任大总统,泛美和会亦有新中立公约之成立,则美国在今后四年间,将埋首于国内经济事业之复兴,以及南北美洲之通盘和平,殆已无疑义。日本与苏俄,自《渔业议定书》延长一年六个月之有效期间后,所谓俄伪边境问题,似亦有继续举行谈判之希望,日俄开战云云,自非最近期内将爆发者。”^①换句话说,孔令侃的判断是,在亚太地区,日美、日苏之间均不会在近期开战,因此和平局面不至崩盘。他最为担心的倒是大国为彼此妥协而牺牲中国利益。孔的判断当然有一些见地,至少日美、日苏关系如其所言,但是,他没有预见到中日两国走向全面战争。1937年的夏天,孔令侃及其同仁陆续从圣约翰毕业,结束了学生生涯。与此同时,七七事变、淞沪抗战相继爆发,南尖社的上海时代宣告结束。

二 战时孔令侃与南尖社的活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南尖社的活动中心由上海转移至香港,这与政府金融机构迁港有关。孔令侃从圣约翰毕业之后担任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南尖社成员如沈震百、钱起凤、申剑秋等亦跟随孔令侃任职于信托局。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中央信托局部分机构迁至香港,由孔令侃负责对外贸易事业。此后,总局正式迁港办公。^②沈震百等人亦随孔令侃来到香港。中央信托局迁港后,起先租用港岛皇后大道(Queen's Road)汇丰银行大厦2楼112号办公。112号内有20间办公室,孔令侃在其中的8号房间办公,办公室内由其秘书许性初掌管文件。隔壁7号房间外面是信托局人事科,里面是孔的私人随从班子,南尖社成员钱起凤等皆在其中。^③此后,孔令侃又将自己的办公室迁至九龙弥敦道(Nathan Road)172号。从1937年8月至1939年9月,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孔令侃以常务理事身份执掌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的业务大权。尽管局长叶琢堂、常务理事俞鸿钧亦在香港,但正如港府所判断的,“孔令侃的地位是最高的”。^④这个“地位最高”的年轻人时年21岁。

随着孔令侃权势和地位的提升,南尖社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香港警察当局判断,南尖社在香港的成员大约有64人,其中34人经查证与中央信托局有直接关联。此外,南尖社留在上海的、已为香港警察掌握姓名的还有18名成员。^⑤早期的社员中,沈震百、钱起凤等人跟随孔令侃赴港,邢铎、罗明湛等人则留在上海。除此之外,笔者还在香港警察当局掌握的南尖社成员名单中发现了一

① 孔令侃《一九三七年国际政局之展望》,《南尖季刊》创刊号,1937年2月。

② 谢永栋《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研究(1935—1937)》附录一《中央信托局大事年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03—204页。

③ 徐家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寿充主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89—90页。

④ Memorandum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the Banishment from the Colony of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at 172, Nathan Road and with the Nam Chim She. November 17, 1939, FO 371/23520. 据徐家涵回忆,中央信托局局长叶琢堂身兼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他对局务不闻不问,仅盖盖图章而已。俞鸿钧虽是常务理事,但更多是以上海市市长身份,担任政府驻香港的外交代表,局里重要公事虽也送给他过目,但他决不自作主张。徐家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寿充主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89页。

⑤ Memorandum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the Banishment from the Colony of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at 172, Nathan Road and with the Nam Chim She. November 17, 1939, FO 371/23520.

些身份特殊的新成员,如马季良、袁水拍等。^①

马季良,以“唐纳”之名闻于世。他1914年5月生于江苏苏州,本名马继宗,又名马骥良,早年参加共青团组织,1932年入读圣约翰大学,是30年代活跃在上海文艺界的编剧和评论作家。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季良曾经担任了一段时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Kerr)的中文教师,来往于沪、港、渝三地之间。^②近年来,随着夏其言一系列回忆文章的发表,叶永烈、贺越明等对马季良的身份进行了比较严谨的考证。可以确信的是,马季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已经加入了中共。^③虽然笔者尚无法得知马季良加入南尖社的具体细节,但许多资料都表明,马季良的确与孔令侃关系密切。^④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曾在1939年7月告诉卡尔,马季良是“与中共及国民党联系紧密的人”。^⑤

袁水拍,1916年3月生于江苏吴县,原名袁光楣,与马季良是省立苏州中学的同学,两人关系密切。袁水拍加入南尖社的细节,由于资料所限,笔者亦未明了。从个人经历来看,他可能与孔令侃有过接触。袁水拍曾在沪江大学商学院读过一段时间夜校,从1934年起,他长期在中国银行任职。淞沪抗战爆发后,袁水拍随中国银行迁至香港,于1938年加入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这也比较符合袁水拍在南尖社中的身份——香港警察掌握的名单中标明其为南尖社“文艺部门成员”。^⑥马季良和袁水拍,在当时,前者已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后者受其外围组织影响,而两人又同时与孔令侃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他们之所以加入南尖社,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动机,其中具体情况尚待新史料的发现方能明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众多中国政府机构迁至香港办公,与国内主要通过无线电报联络。按照香港本地法例,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私自设立无线电台,因此,港府特许香港大东电报局(Cable & Wireless Limited)承揽中国政府在港机构的电报收发业务。^⑦然而,孔令侃所负责事项,除了中央信托局的正常业务外,有不少是“地下工作”,包括情报收集、除奸暗杀等秘密行动,需要同上海、武汉、重庆等地频繁使用无线电联络。因此,当孔令侃迁至九龙弥敦道172号办公后,又在176号设置了一座秘密电台。弥敦道172号与176号同在一幢大厦之内,前者位于4楼,后者位于3楼,可以通过屋顶平台相连,对于收发电报而言固然方便,但是,两处离得如此之近,有增加电台暴露的风险。因该幢大厦完全是欧洲人的生活区,不仅有欧洲人租住的公寓,一楼还有一家西餐馆,每天熙来攘往。可能是基于上述原因,孔令侃又将秘密电台从该处迁出,移至弥敦道771号,该处只有少数欧洲人,大多是普通中国人在此居住。^⑧

① 在香港警察掌握的南尖社成员名单中,马季良列在D名单,即活动在上海的南尖社成员,英文名写作“Ma Chi-liang”和“Ma Ki Leung”,在孔令侃使用的密码电报中代号“300”;袁水拍列在A名单,即活动在香港的南尖社成员,英文名写作“Yuan Shun Pak”,密码电报代号“3342”。Memorandum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the Banishment from the Colony of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at 172, Nathan Road and with the Nam Chim She. November 17, 1939, FO 371/23520.

② A. Clark Kerr 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21, 1939, FO 371/23520, p. 250; Minutes, February 21, 1940, FO 371/24699, p. 193. 任嘉尧《唐纳胸怀祖国情系家园》,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总第26辑,2011年,第216页。

③ 这方面的史料及研究参见夏其言《怅抚残简忆唐纳》,《新闻记者》1989年第2、3期;贺越明《唐纳:神秘的身份之谜》,《同舟共进》2012年第10期;叶永烈《唐纳的真实身份》,《同舟共进》2013年第11期等。

④ 战后,孔令侃回国后任用马季良为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夏其言为首席记者。1947年政局逆转,孔令侃逼令《时事新报》转向。马季良、夏其言等发表声明,集体退出《时事新报》编辑部。邹凡扬《事非经过不知难——夏其言和我的师友情谊》,王维等编《夏其言同志纪念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8页。

⑤ Minutes, February 21, 1940, FO 371/24699, p. 193.

⑥ 叶遥《怀念袁水拍》,《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3期;Memorandum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the Banishment from the Colony of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at 172, Nathan Road and with the Nam Chim She. November 17, 1939, FO 371/23520.

⑦ Secret Telegram by G. Northcote, November 9, 1939, FO 371/24699, p. 199. 又据徐家涵回忆,中国政府一些在港机构亦通过交通银行设在香港的中国电报局与国内进行电报往来。徐家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04页。

⑧ Memorandum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the Banishment from the Colony of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at 172, Nathan Road and with the Nam Chim She. November 17, 1939, FO 371/23520. 据徐家涵回忆,秘密电台使用的是位于九龙的财政评论社楼上的房间。徐家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04页。

战时孔令侃与南尖社在香港的活动主要有四类：一是办理中德易货贸易；二是参与中日秘密交涉；三是搜集情报；四是组织暗杀。严格意义上，前两类活动是孔祥熙在武汉和重庆主导推进，而后两类活动则是由孔令侃在香港主持进行。中德易货贸易，即中国向德国出口钨砂等军工原料，用以抵偿购置德国军火的贷款。在中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的情况下，货品结算及交运主要通过香港渠道进行，孔令侃在香港协调处置。有关孔令侃在中德易货贸易中的角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在《民国档案》上公布了一批相关档案，对此已有相当披露。^① 值得一提的是，孔令侃还利用此契机，通过中央信托局系统，在香港成立兵工储料处和运输科，并将南尖社成员钱起凤、何然棣等安排其中，空领薪饷。^② 而香港警察当局在搜查过程中，亦发现大量中德贸易文件和德国向中国出口武器的合同，引起当局高度重视。^③ 至于孔祥熙与中日秘密交涉，学界研究已比较充分，此处不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事涉机密，孔祥熙身份又十分敏感，上海沦陷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孔祥熙操控与日方联络，主要是通过香港的孔令侃和在上海的胡鄂公^④进行的，由此构成了孔祥熙（汉、渝）、孔令侃（港）、胡鄂公（沪）之间的三方联络、情报网络，由此可见孔令侃的作用。甚至今井武夫1939年曾多次提出要和孔令侃见面，终因种种原因未果。^⑤ 但是，南尖社其他成员究竟在这两类活动中参与到何种程度？扮演何种角色？起到何种作用？由于资料所限，笔者尚无法知悉。可以推测的是，孔令侃在处置此类事件中，相当多的事务工作是由他的小班底负责处理的。

搜集情报是南尖社另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这其中既包括对日伪的情报搜集，也包括对英国的情报搜集。前者的工作与对日秘密接触有关，孔令侃主要通过在上海的胡鄂公进行。胡鄂公曾将日本策划“唐绍仪工作”以及土肥原贤二谋筹江汉伪政府等情报通过秘密电台向孔令侃报告。^⑥ 后者的工作则更具“戏剧性”——香港政府在查获的南尖社文件中竟然发现大量英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秘密文件，其中甚至还包含驻华大使与伦敦及东京之间的电文往来。^⑦ 中国当时的技术并不足以破译英国的外交密码电报。孔令侃是如何获得这些文件的呢？根据港府提供的资料，英国外交部经过内部调查，终于找到了“偷窃”文件的人，他就是驻华大使卡尔的中文教师马季良。据卡尔报告，直至1939年3月之前，马季良一直担任他的中文教师，那些文件应当是在自己位于上海的住宅中被马季良获取并复制的，因为写字台抽屉没有上锁。另一次文件泄露可能发生在重庆，此时，马季良已经离沪赴渝，他于1939年5月的某一天在重庆的宾馆中拜访了卡尔，当时卡尔正在使用打字机给外交部写报告，有一段时间，卡尔离开了房间，马季良乘机对电报稿进行了摘抄。^⑧ 除此之外，就在香港警察搜查中央信托局不久前，马季良还与英国大使及其下属以及使馆的杂役保持密切接触，以便向孔令侃报告。^⑨

卡尔估计，可能有6份文件遭到泄露，其中包括1939年1月4日使馆（重庆）致上海的第12号电报（抄送外交部第6号电报）；1月4日使馆（重庆）致上海的第13号电报（抄送外交部第7号电报）；1月13日上海致外交部第41号电报；1月18日外交部致东京第21号电报（抄送上海第40号

① 相关资料参见戚如高编选《抗战爆发后中德易货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1995年第2、3期。

② 徐家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寿充主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97页。

③ The Governor to H. B. M. Ambassador, 13th October, 1939, FO 371/23520, p. 216.

④ 胡鄂公，字新三，号南湖，1884年生，湖北江陵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北方起义，191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在北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胡鄂公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36年被捕，出狱后在潘汉年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抗战期间，他担任孔祥熙的政治顾问，来往于沪、港两地，为国共两党做秘密工作。1943年，胡鄂公脱离中共，抗战胜利后担任孔氏家族出资的上海《时事新报》总经理兼发行人。上海解放前夕，胡赴台湾，1951年病逝于台北。

⑤ 杨天石《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重庆市档案馆曾公布了这方面的档案，参见陆大铨等选编《胡鄂公为呈报土肥原谋筹江汉伪政府有关情况致孔令侃密电一组》，《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冯敏等选编《胡鄂公密报日本策划“唐绍仪工作”致孔令侃等电一组》，《民国档案》1998年第1期。

⑦ Minutes, February 21, 1940, FO 371/24699, p. 193.

⑧ A. Clark Kerr to Foreign Office, November 21, 1939, FO 371/23520, p. 250.

⑨ Minutes, February 21, 1940, FO 371/24699, p. 193.

电报)；1月23日上海致外交部第52号电报和5月4日大使致外交部第30号绝密电报。^①不过，英国外交部对文件泄露的范围及马季良获取的情报的重要性存在争议。有官员认为，上述有可能泄露的文件中，后三封电报的内容已经被中国政府掌握，并且不排除日本方面也获取了相应的内容，尤其是最后一封电报。^②还有的官员认为，根据查获的南尖社文件，只有两份涉及官方通信。主要是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1938年12月2日的第981号电报。而马季良发给孔令侃的报告中，引用这封电报的内容只有10%—20%。另一份泄露的文件是外交部1939年7月12日致东京和上海的电报，马季良可能只是间接接触到这封电报的内容，他发给孔令侃的报告内容混乱，很多判断建立在谣言的基础上。^③

更令香港政府恼火的是，南尖社的活动还包括针对通敌者的暗杀行动。从警方的报告来看，港府实质上是将南尖社作为暗杀组织看待的。警方认为“自1938年8月，南尖社的主要负责人和所有成员，都参与了组织暗杀小组。实际上，这个组织的相当一大部分活动都与暗杀活动有关。”^④根据香港警察的调查，南尖社在上海至少成立了两个暗杀小组。其中一个暗杀小组在报告中提到，他们从香港得到指令，在上海接受小组负责人领导。报告还涉及暗杀小组的成员资格以及训练事宜。例如谁开第一枪，谁开第二枪，谁负责监视，谁负责发信号，以及如何撤离等。报告提出，应当租下一所房子，用人物和动物的雕塑进行艺术装饰，这样，武器和弹药可以隐藏其中。此外，还应当准备另一所房子用于通信联络。小组的目标是暗杀日本军官和汉奸，摧毁其谍报系统。小组将以法租界为基地，在公共租界进行暗杀，制造英国和日本之间的摩擦。^⑤

南尖社主要策划了暗杀邵式军的行动，不过最终未能成功。邵式军1910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外祖父盛宣怀，父亲邵恒生，长兄邵洵美，岳父蒋百器。邵式军在上海沦陷后附敌，出任“苏浙皖三省税务总局”局长。大约从1938年夏天起，南尖社就一直在策划暗杀邵式军的行动。上海暗杀小组对邵式军在南洋路39号的房子、保镖及其日常生活等状况进行了细致调查，因其防卫森严，请求孔令侃让他们先去制裁别的汉奸。但孔不同意，要求在杀掉邵式军之前不得打草惊蛇。^⑥1938年10月17日下午5时25分左右，邵式军乘车由九江路税务局出发，当行至江西路路口时，遭遇袭击，座车中弹11发。因邵式军乘坐的是防弹轿车，子弹未能射穿钢板，得以保命。^⑦上海小组立即向孔令侃报告了此次暗杀未遂的经过，并表示将继续对邵式军进行袭击。孔令侃对此将信将疑，彼时国民党有多个除奸组织在上海，以邵式军为目标的，应当不止南尖社，因此他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自己人进行了此次未遂暗杀。此事之后，一方面，孔令侃积极为下次暗杀做准备，他尽量满足上海暗杀小组提出的装备手榴弹、驳壳枪等要求，并催促他们尽快动手；另一方面，孔令侃担心自己被骗，要求在用于下次暗杀的武器上刻上秘密符号或文字，以备遗留在现场，借助报纸报道可以明确是何人所为。暗杀小组还向孔令侃提出，可以用15万港币买通邵式军的两名保镖，但此提议被驳回。因为在此之前，孔令侃已听说戴笠曾准备用12万港币买通邵的保镖，但这笔钱经过多次转手，到两名保镖手中已所剩无几，他们拒绝去做。沪港两地的电报显示，直到1939年5月17日，上海方面还在表示，他们确信有机会在1940年春节期间干掉邵式军，而沪港双方最后一次联络是当年的8月2日。^⑧

① List of Documents Compromised, FO 371/23520, p. 254.

② R. G. Howe to A. Clark Kerr, January 8, 1940, FO 371/23520, p. 255.

③ Minutes, February 21, 1940, FO 371/24699, p. 194.

④ Memorandum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the Banishment from the Colony of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at 172, Nathan Road and with the Nam Chim She. November 17, 1939, FO 371/23520.

⑤ R. Ellis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October 4, 1939, FO 371/23520, pp. 218—219.

⑥ R. Ellis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October 4, 1939, FO 371/23520, p. 220.

⑦ 《汽车上弹痕累累 邵式军反不死》，《申报》1938年10月18日，第9版。

⑧ R. Ellis to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October 4, 1939, FO 371/23520, pp. 222—224.

三 香港政府搜查南尖社及事件善后

搜查行动开始之前,香港政府显然已经掌握孔令侃私设秘密电台的情况。前文提及,香港本地法例禁止私设电台,中国政府驻港机构应当通过香港大东电报局办理电报收发业务。然而,事实是中国政府及国民党的一些组织并未遵守此项法例,私设电台的不只中央信托局。同一时期,至少宋子文和中国海关也在使用秘密电台收发电报,香港政府对这些“特殊”的个案有时采取容忍和默许的态度。^①面对日本侵华,英国既不甘心放弃在华利益,也不愿意直接与日本对抗,而对中国的抵抗往往抱持同情态度。英国一方面在道义上支持中国,另一方面又在对日妥协退让,其政策往往矛盾而反复。具体反映在香港政府的立场上,至少广州沦陷之前,港府一直在维持着香港与九广铁路(KCR)作为重要物资输华的基地和通道,对于国民党在香港的活动,只要其不危及港府统治和香港安全,当局一般予以容忍。因此,一开始,香港政府对于孔令侃私设电台,也仅是通过第三方进行口头警告。香港总督罗富国(Geoffrey Northcote)1938年4月曾向蒋介石的顾问端纳(William Donald)提及此事,但端纳因不知道应当如何对孔解释,且未能见到孔而未予告知。端纳推测,罗富国应该也将此事告诉了宋子文,但他不能确定宋是否告知了孔令侃。^②

然而,随着广州沦陷,加之欧洲局势不断恶化,香港政府对国民党在香港的活动态度转趋强硬。在致港督的电报中,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直截了当地阐明香港必须对日妥协的原因:“这个殖民地的历史表明,香港必须要与实际控制广州的政权相处。之前是孙中山、西南政务委员会、南京中央政府,而现在是日本人。”^③“虽然对中国抱有天然的同情心,但香港要准备向日本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对香港发动任何袭击的后果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④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此段时期,正是英日之间关于英国在华租界问题矛盾不断扩大之际。在香港警察搜查中央信托局之前的半年,正值天津英租界危机爆发,英国疲于应付,当年7月,英日之间缔结《有田—克莱琪协定》,而天津英租界危机尚未完全解除。8月,香港又发生沈崧被刺案。

沈崧,即沈次高,汪精卫外甥,参与汪氏附敌活动。1939年8月22日晚8时40分,沈崧乘汽车至皇后大道中云咸街(Wyndham Street)街口娱乐戏院左侧下车,步行前往安澜俱乐部。当沈行至南华早报社门前时突遭枪击,之后,又有两人持斧砍击沈的头部,致其身亡,而所有刺客均迅速逃离现场。^⑤沈崧被刺案与引发天津英租界危机的程锡庚被刺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香港政府对此极为警惕,担心天津的局面会在香港重演。最终促使港府“出手”的,可能还是1939年9月,欧战爆发。港督曾在致驻华大使的电报中表示:“让我非常担心的是整个反日、反汪精卫,以及令人确信的间接反英活动。我强烈感觉,香港不应作为上述活动的基地,尤其现在日本是英国潜在的敌人。”^⑥因此,在这样的压力氛围下,香港政府最终下决心对孔令侃实施搜查行动。

1939年9月25日晚,香港警察当局会同电讯检查人员突然搜查了中央信托局在九龙弥敦道172号和771号两处办公地点,逮捕钱起凤、申剑秋等6人,破获秘密电台一部,查获左轮手枪两支以及大量秘密文件。以中央信托局为活动基地的南尖社终于暴露了。香港总督罗富国在致殖民地

① G. Northcote to A. Clark-Kerr, October 16, 1939, FO 371/23520, p. 242. 据徐家涵回忆,中央银行和西南运输公司也自设电台,前者设在罗湖深圳边界,后者设在西环海岛上的军火仓库内,这些都是香港政府默许的。徐家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04页

② W. H. Donald to W. E. Witham, September 28, 1939, FO 371/23520, p. 226.

③ Consul-General Blunt (Canton) to Governor Hong Kong, December 16, 1938, FO371/22150, p. 289.

④ Consul-General Blunt (Canton) to Governor Hong Kong, December 16, 1938, FO371/22150, p. 291.

⑤ 《沈崧在港被刺毙命 枪击之后再施斧砍 凶徒多人均被逃脱》,《申报》1939年8月29日,第8版。暗杀沈崧的行动应是军统局特工所为。香港政府在查获的南尖社文件中也发现了有关沈崧被刺事件的信息,见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Office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Colonial Office, October 21, 1939, FO 371/23520, p. 210.

⑥ G. Northcote to A. Clark-Kerr, October 16, 1939, FO 371/23520, p. 243.

部的报告中声称,被捕的6人中,4人是电台报务员,2人是书记,有2人还携带了武器,至少已有一人供出他为孔祥熙所雇。罗富国向殖民地部表示“除了违反电讯检查条例,此行为亦是对检查制度不可容忍的破坏,因此,我对此极为关注。我怀疑,香港可能还有其他的电台设备。假若如此,我相信您可以通过中国政府对此施压。”^①

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着手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交涉。1939年10月4日,中华民国驻英国大使馆参赞陈维城造访英国外交部,他表示,据其所知,由于大量重要文件被香港警察当局抄走,办公室被封闭,导致中央信托局的职员迄今无法上班。陈维城指出,被抄走的文件中“有大量对中国的敌人有重大价值的内容”,他请求香港政府不要把此类文件泄露给任何未经授权的人。^②就此,英国外交部向港督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态度。罗富国对此相当不满,一方面,他将查获的有关南尖社涉及暗杀邵式军的文件发给外交部,从而证明事件的严重性。并利用驻华大使卡尔到港公干的机会,与其讨论了此事件的所有方面。^③另一方面,他驳回了陈维城提出的要求。港督表示,根据律政司的建议,直到该案审判结束之前,中方人员不得进入被搜查的处所,不得接触被扣文件。^④随后,英国外交部对陈维城表示,可以向其保证,任何秘密文件都不会落入未经授权人之手,已经签发了最严格的指令去防止此类事件发生。^⑤

中国政府处理涉港事务,除了外交系统(主要是驻英国使馆和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也利用一些私人关系进行交涉。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和中茶公司英籍顾问韦纯(W. E. Witham)就扮演了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之间的“信使”角色。事件发生后,端纳通过韦纯向港督罗富国转达了他的建议。端纳在致韦纯的信中表示,孔令侃对两点感到焦虑:一是他的文件有可能泄漏给汪精卫或日本人;二是香港警察逮捕的人是“无辜”的,这些人可能遭到监禁而不仅是罚款。孔令侃提出,他自己负全部责任,应当对违反香港法律承担相应后果。如果仅是罚款,那倒是没关系。如果判罚监禁,那他将去代替那些被逮捕的人受审。端纳认为,如果孔令侃接受审判,将会显得中国大公无私,而使作为侵略者的日本高兴。作为国联成员的英国,有权采取行动协助中国抵抗日本。除此之外,为促成事件妥善解决,端纳还提出了一些“交换条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新疆地方当局阻挠英国在喀什的领事馆设置无线电台,此事经多次交涉未果,而孔令侃的父亲孔祥熙可以负责协调;二是中国与缅甸之间的航线,中国交通部已经承诺交给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运营,孔祥熙有权更改,可以交给英国的帝国航空公司运营;三是面对日本的威胁,蒋介石答应强化华南防御并与香港防卫计划相衔接,而香港防御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人力,蒋表示可以调遣一万到两万人的部队,跟据英国军方的安排部署。^⑥

端纳的相关看法和建议,体现了孔令侃对此事件的关切点。从中可以看出,孔令侃不大在乎罚款之类的惩罚,他主要忧虑的是被逮捕的钱起凤、申剑秋等南尖社成员被判入狱服刑。对端纳的建议,港督有如下看法:第一,罗富国表示,对于查获的秘密文件泄露的问题,没有理由担心这些文件的安全。第二,针对孔令侃要求代替被捕的人受审,罗富国指出“英雄辞藻对我来说没有说服力,如果孔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我是不相信),他将不会使被捕的人得到任何好处,而将置自己于尴尬境地。”第三,关于孔令侃暗示自己没有意识到香港禁止私设电台的事情,罗富国表示不相信。^⑦罗富国将自己的看法告知韦纯,他又特意强调“孔令侃任何自证其罪的行动都将使政府别无选择,只

①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September 26, 1939, No. 305, FO 371/23520, p. 194.

② The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Office,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Colonial Office, October 6, 1939, FO 371/23520, p. 201.

③ The Governor to H. B. M. Ambassador, October 13, 1939, FO 371/23520, p. 216.

④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Office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Colonial Office, October 21, 1939. FO 371/23520, p. 210.

⑤ R. G. Howe to Chen Wei-cheng, November 1, 1939, FO 371/23520, p. 211.

⑥ W. H. Donald to W. E. Witham, September 28, 1939, FO 371/23520, pp. 225—226.

⑦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September 29, 1939, No. 317, FO 371/23520, p. 200.

能起诉他,这容易导致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尴尬。”^①关于端纳开出的“交换条件”,英国外交部明确表示“非常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希望利用香港非法无线电台的事作为我们在喀什电台事件的筹码。”^②

面对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的持续施压,罗富国不断向伦敦外交部和重庆大使馆提供查获的秘密文件,以此证明搜查中央信托局并非小题大做,并不是仅仅因为其私设电台,主要是因为孔令侃领导的南尖社以香港为基地策划了一系列情报与暗杀行动,尤其是窃取英国情报并试图激化英日之间的矛盾。^③罗富国希望驻华大使卡尔能够向蒋介石转达他对此事的看法。罗富国认为,孔令侃“恶劣地破坏了双方原本的融洽——战争期间,当局一直乐意让中国政府的机构待在香港”。罗富国承认搜查中央信托局办公室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使用非法的无线电台,并且用密码发报,在战时是不能忽视的严重罪行。尽管如此,当局也并没有禁止所有中国政府在港机构私设电台。^④除此之外,港督还表示,孔令侃主要犯了两个错误,“一是用危险的行动去对待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二是严重违反了我们对中国政府在香港机构的善意”。罗富国指出“我们还不知道在防务方面有多少信息通过中央信托局的电台泄露,但是我们清楚,我们的信任得到的却是这样的背叛。我的内心无可争辩,搜查和扣押他们的文件是完全合理的。”^⑤而港督最主要的忧虑还是担心孔令侃及南尖社肆无忌惮的行动会将香港变成反对日本的基地,在欧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日本咄咄逼人,孔令侃及南尖社将威胁到此地的稳定与安全。

尽管存在着诸多分歧,香港政府最终还是决定本着理性的原则妥善处置该事件。对于港督而言,他虽然明确将南尖社的性质定为暗杀组织,并多次强调南尖社窃取英国驻华大使馆情报行为的严重性。但是,这些活动并没有留下直接的证据可供本地法律采纳审判。另一方面,英国毕竟对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予以道义上的支持,因担心影响大局,驻华大使卡尔建议罗富国对被捕的6人最好不要处以监禁,而是以罚款来替代。1939年10月4日,被捕的钱起凤、申剑秋等6人在九龙地方裁判法院受审,被控“未经政府许可私设电台”以及“无照拥有无线电报收发装置”两项罪名。法官开出了每人4000港币的保释金。^⑥经过几周的审判程序,最终结果是4人被判罚3000港币,2人被判罚2000港币。^⑦法官在审判结束时公开声明,如果再发现类似罪行,将会予以严厉惩罚。至于如何处理孔令侃,港督希望通过驻华大使向中方转达他的建议“中国政府最好能做的是让孔令侃永远离开香港。”港督认为“之所以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对这样的违法行为进行更严厉的处罚,主要是基于对中华民国为生存而斗争的潜在同情。”^⑧

庭审的结束,并不代表整个事件就此终结。香港警察当局根据查获的文件,列出A、C、D三份南尖社成员名单。^⑨其中A名单包括孔令侃、沈震百、钱起凤、申剑秋、袁水拍等34人。警方指出,该34名南尖社成员均是“参与弥敦道172号的重要工作或于弥敦道771号无线电台有联系的人”。负责侦办的代理副督察埃里斯建议,应当告知这些人,他们不受本地欢迎,若不愿离境,根据1935

① The Governor to H. B. M. Ambassador, October 13, 1939, FO 371/23520, p. 216.

② Minutes, November 10, 1939, FO 371/23520, p. 214.

③ Extract from Letter from Sir Geoffry Northcote (Hong Kong) to Mr. Gent, Colonial Office, October 14, 1939, FO 371/23520, pp. 245—246.

④ G. Northcote to A. Clark-Kerr, October 16, 1939, FO 371/23520, p. 242.

⑤ Extract from Letter from Sir Geoffry Northcote (Hong Kong) to Mr. Gent, Colonial Office, October 14, 1939, FO 371/23520, p. 246.

⑥ “Unlawful Wireless. Six Men Face Charges of Maintaining Station. Case in Kowloon Cour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5, 1939, FO 371/23520, p. 228.

⑦ Memorandum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the Banishment from the Colony of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at 172, Nathan Road and with the Nam Chim She. November 17, 1939, FO 371/23520.

⑧ Secret Telegram by G. Northcote, November 9, 1939, FO 371/24699, p. 200.

⑨ B名单中有3人,香港警方认为,他们均为低级文员,仅在弥敦道172号的办公室有办公桌,没有发现他们是南尖社成员的证据。

年《递解外国人出境条例》(The Deportation of Aliens Ordinance 1935),当局将启动法律程序,禁止他们在港居留。若他们自愿离境后未经允许返回香港,当局会将其驱逐出境。警方确信,C名单中的30人也是南尖社在香港的成员,但他们没有从事和A名单上的人一样的工作,至于是否需要将其驱逐出境,尚待考虑。D名单中包括马季良、邢铎、罗明湛等18人,他们是在上海的南尖社成员。埃里斯建议通过孔令侃告知这些人,他们不受香港欢迎,若未经允许赴港,将会被驱逐出境。^①港督对埃里斯的各项建议均表赞同,指示尽快落实。

在香港政府施压下,孔令侃最终被迫离开香港,乘船赴美,南尖社的活动在历史舞台至此落幕。顺便提一句,英国在这起事件中还有一个“意外”收获。由于孔令侃的电台使用的是中国政府的密码收发电报,英国军方对此极为重视,在他们的建议下,港督将查获的密码本和电报样本进行了复制,并通过安全渠道寄送伦敦密码破译部门。^②可以推测,在战争期间,英国可能通过此次密码破译,进而掌握了中国政府的某些情报,这恐怕也算是孔令侃与南尖社留给历史的另一个印痕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3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于 行)

^① Memorandum and Recommendations as to the Banishment from the Colony of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at 172, Nathan Road and with the Nam Chim She. November 17, 1939, FO 371/23520.

^② A. Clark-Kerr to Ashley-Clarke, November 16, 1939, FO 371/23520, p. 238.

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oroughly the allocation of the one – million compensation and in doing so it brings to light the embarrassing truths involving France's extortion of money from the Qing government , the collusion between French government and missionaries , and the evilness of foreign firms.

Sun Yat – sen and the Theory of the Heavenly Mandate

YE Bin

The theory of the Heavenly Mandate was the main theory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dynastic China , and it was still very influential in the 1900s when the Qing Dynasty was coming to an end. Sun Yat – sen took advantage of the theory of the Heavenly Mandate in both strategic and theoretic ways. Strategically , he claimed that the Qing court was losing its Heavenly Mandate , and insinuated that he himself would be the next bearer of the Mandate , knowing that such information would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camp. Theoretically , Sun reinvented the theory of the Heavenly Mandate , claiming that a true leader of the people should be one who knew the global trends before everybody else , and should be able to convince the people to follow him.

Cooperation , Competition and Dispute around the Phosphate Exploitation in the Xisha Island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1917—1930)

XU Long – she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Japan's increasing demand for importing phosphate rock , Japanese business circles and government aimed their target at South China Sea to exploit phosphate. Hirata Sueharu , a Japanese businessman , sought to cooperate with He Ruinian who was a Chinese businessman obtained mining license from Guangdong government. Japan exploited and transported phosphate rock in the Xisha Islands with its capital control. He's mining license wa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local political situ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Japanese merchants also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 which caused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 General of Formosa to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China and Japan confron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commercial rationality and government interest. The cooperation , competition and dispute around the Phosphate exploitation in the Xisha Islands also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and adjustment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ftermath of the Revolution: A Study on 1930'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s Agitation in Shanghai

YANG Xiong – wei

Pharmaceutical industry's agitation in Shanghai which broke out in March , 1930 due to the arrangement policy of the jobless had strong characteristic of organization. Workers had the support from pharmaceutical industry's labor union and other staff unions , while employers were supported by pharmaceutical industry's trade association and Merchant Group Organizing Committee. This agitation finally calmed down with the effort of central and local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es. It reflected the problems of power structures which existed in the National Republic government's central – local relations especially party and government relations. Under this political background , labors and employers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expressed their demands by petition and public opinion warfare. This agitation was started by labors and then Shanghai Kuomintang manipulated it secretl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revolution ethics. The reason why it erupted in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was because of its peculiarity of historical grievances , realistic difficulties and so on.

David Kung and Nam Chim She's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UN Yang

In March of 1936 , David Kung (孔令侃) convened his schoolmates of St. John's University including

Shen Zhenbai (沈震百) to found Nam Chim She (南尖社) in Shanghai. The association was overtly keen on academic research before the breakout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 – Japanese War , but covertly served as the bedrock of David Kung's future political career. As a result of Shanghai occupied by enemy , the association was shifted to Hong Kong and henceforward involved in underhand activities which were in the charge of Kung Hsiang – hsi (孔祥熙) and David Kung. The mission of the association included taking on the liaison and general affairs work of negotiation with Japan and barter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Moreover , it was also engaged in gathering the intelligence of Japan and Britain and staging assassinations on traitors. Finally , the association was suppressed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1939.

Moving Towards Socialism: Grain Market and State Macro – Control in the Early Period of P. R. C

WANG Chun – ying , ZHANG Yan – mei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 R. C , the new government gradually regulated grain market by controlling grain price , sales channels and reserves in three ways. National grain market stabilization had largely been achieved according to quantized data in late 1952. The price volatility of grain closed to zero before the state implementing policy of unified purchase and sale in October 1953. It offered basis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the new democracy could go to socialism very quickly. The found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rain macro – adjusting policy also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both reason and flexibility , which was the adaptive economic policy under the trends of socialism.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helped the new China move towards socialism , but the adaptive policy also included uncertainty which would turn into new hidden trouble in the normal economic environment.

Local – foreign Conflict: The Envision and Actuality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LIN Chao – chao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great leap forward” , need to attract more attention. In order to develop industry , whether relying on the “local method” (relying on the exist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or “foreign method” (relying on modern mechanical equipment) , caused a “local – foreign conflict”. When the conflict came into the official public opinion field , the local solution quickly occupied the absolute advantage , and the attack on the foreign method got to the height of the struggle line. The “local – foreign conflict” appeared to be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 but in reality a propaganda strategy coordinating with policy. It reflected the problem which the socialist China encountered when catching up with the advanced western countries , and carrying ou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Joseon Dynasty and its Remnants

ZHU Mei

Document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he Joseon dynasty embodied report , approved book and true copy of the approved book.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procedure , the head of a household prepared the report; the local authorities issued an official book after checking and approving the report; and finally the household was given a true copy of the book. A large number of reports and copies of approved book were privately collected. The approved books constituted the basis of offici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were usually prepared and preserved by the county and prefectural governments. Governments at sub – county and even lower levels also prepared and kept registration books. Digging into their styles and contents , the report and approved book did not fundamentall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 even though there were indeed sligh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form and style of approved book changed greatly in the 1770s. Then , it did not witness any drastic changes until the daw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